

日本“京都学派”形成的文化地理空间和学术交流空间研究

陳 琳 琳

The Formation of the space of Culture Geography and Academic exchange for the Academic School of Kyoto in Japan

CHEN Linlin

After Japan moved in a capitalist direction by Meiji Reform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modern culture and ideology from Europe became a new fash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occident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became common practice in the first empir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kyo. In such kind of circumstance, a group of pure scholar that headed up by Kanō Naoki started the counterbalance with bureaucratic study in the newly built second empire university-Kyoto university, insufflated a fresh air to the Chinese study in Japan, which was use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This paper uses viewpoints of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al exchange and systematics for reference,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space” to analyse and study “Kyoto school” which gave a forceful blow in the area of Chinese study in Japan. I would like to try my best to interpret the forming of “Kyoto school” from a completely new viewpoint at the basic of the former traditional study about “Kyoto school”. With such kind of viewpoint, we will find out that Kyoto school has two obvious morphologic space, that is cultural geographical space with the feature of “geographical culture” and academic exchange space with a basic carrier of “personnel exchange”. These 2 spaces are not only unique in their style but also have internal connecting link.

These two spaces have autogenetic systems as well as internal relations. The overlapping and conglomerating of these two spaces is originated from the common adm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the pursuance of real Chinese Studies (Sinology), the intersection of same academic fields, and the communion of academic style and value.

Keywords: Academic School of Kyoto; Space; Kano Naoki; Nayitou Kounan; Wang Guowei

序言

“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曾出现于日本很多著作中，所指范围也不尽相同。国内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用到“京都学派”的概念时，多指京都大学文科大学坚持从中国视角研究中国、重视考证、秉承学术独立精神、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教授群体。本文亦指此范围。

在日本，“京都学派”通常有两个所指：一个是指本文所论及的京都学派。另一个是指20世纪以来，以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为代表的哲学研究派别，也被称“西田哲学”流派；前者被称为“中国学的京都学派”（或东洋史学¹⁾的京都学派²⁾，后者被称为“哲学的京都学派”；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欧洲近代思想文化风靡学界，学习西方文化哲学在当时全国唯一的帝国大学东京大学蔚然成风并引领着日本的学术潮流，虽然也开设了和、汉学科，以及教授中国古代典籍的专门讲座，但与传统的汉学家不同，几乎都是经受过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其内心又都与本国的国家体制和皇国的利益黏着在一起，试图通过对中国文化思想新的诠释，来实现旧儒学伦理的复活。”³⁾ 1890年明治天皇发布《教育敕语》，官学体制学者的代表井上哲次郎为其撰写了具有鲜明观点即教育学术为政府服务的《教育敕语衍义》，成为此后半个世纪日本国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基本国策，也成为东京大学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学术教育和研究的指导性纲领，由于井上哲次郎以及其周围一批御用学者存在，东京帝国大学成为日本中国学的“官学大本营”。

在此种文化态势的重压之下，一批追求纯粹学问的学者，也正在积蓄力量酝酿着如何在“官学”思想统治的研究学界吹起一股清新的学风，为首的便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想要培养更多的人才以适应日本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京都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并设立文科大学的呼声和动议成为现实，也为京都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有形的“文化地理空间”。此后，以狩野直喜为首的一部分文科大学的学者们便以京都大学为基地，通过交流、碰撞、融合，渐渐在学术态度、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形成较一致的观点，开始了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并驾齐驱，后来，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涉入，使得京都学派在研究方法、领域、研究热情等方面更加焕然一新，在中国戏曲、金石、甲骨、敦煌、俗文学等不为世界、甚至不为中国学者所熟知的领域，率先突破，取得了令当时世界瞩目的开拓性成就，逐渐形成“中国学的京都学派”，在当时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界掀起了一股热潮。

本文尝试运用文化地理学和文化交流学理论中的“空间”这一概念，并结合系统论来研究京都学派。本文所谓“空间”概念源自于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交叉——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在承认空间的客观地理属性之外，又给“空间”这个概念增加了其它新内容。新文化地理学发展早期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提出“空间是通过人类的社会活动产生的，是一个容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等多维要素在内的集合”，其代表人物是福柯。继续发展的过程中，迈克·克朗在其有名的著作《文化地理学》中，又在“空间”的概念上强调其文化定位，即不再把空间看作是纯粹的地理景观，而将其看作是被赋予了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他指出“地理景观是不同的民族与自己的文化相一致的实践活动的产物。”⁴⁾ 在“空间”的社会属性方面又增加了其文化属性。地域包括自然景观、自然环境，也包括历史遗留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景观和历史环境，而文化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存在，是最能代表这一空间属性的“根基”，也是能够使空间性质发生变化的因素，包括历史、学术等等在人们思想层面起作用的复杂因素。因此这里的“空间”已经不

1) 日本学界所说的东洋史学一般是指以中国史学为中心的东亚范围的历史研究。

2) 战后，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中心，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学者群体，被称为“新京都学派”，以区别于传统的“京都学派”。

3) 严绍璁《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实证论与经院派学者——日本中国学家狩野直喜·武内义雄·青木正儿研究》，岱宗学刊，1997年第2期。

4)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再单纯是一个地理的区域。

笔者认为：京都学派的形成首先离不开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地理空间，其次离不开一个拥有共同背景的学术交流空间。这两个空间既自成系统，又有内在的关联。每个空间内部的诸要素在系统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同时，又与其他系统的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大更新的空间——完整意义的京都学派。

1 京都学派得以形成的文化地理空间

1.1 京都学派文化地理空间内部的双层结构

京都学派的文化地理空间内部，实际上由一个双层的地域空间构成。它的外层是京都地区，内层是京都大学文科大学。外层起重要作用的是京都地区积淀深厚的有形和无形的中国文化基因、地域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古朴优雅并崇尚学问的民风、与文化氛围相辅相成的自然和风貌，它们给京都大学在京都的创立提供了文化地理的独特空间。而京都大学的成立特别是其文科大学的成立，又给京都学派的形成创造了一个集中的、便于学者间交流、相互影响、趋同接近的内层空间。京都大学文科大学创立之初确定的自由开化的学风，是京都学派能够不受各种制约和束缚、快速朝着理想中的中国学研究前进的开放式平台。

在京都学派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京都地区和京都大学文科大学这两个层面的空间，究竟各自是怎样的一个基本形态和构成要素，他们在京都学派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它们又是如何相互映衬融合、共同创造出其文化地理空间的。这是我们要首先解答的问题。

京都大学能够在京都地区建立，除了考虑要在日本国内的地理空间上形成平衡之势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京都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和迥然不同于东京的学风和学术传统。

1.1.1 京都学派文化地理空间的“外层空间”——京都地区的自然风土和历史文化

京都被称为“千年古都”，它曾经是日本历史上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区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于历史时期日本上层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追随，京都地区集中了很多有着深厚汉学功底的家族。虽然明治维新以后京都不再是日本的都城，但是它仍然保留着作为古都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学术传统，京都市民也存留着优雅的古都遗风，在失去了都城地位之后，京都市民的优越性受到挫折，他们强烈希望能在京都地区建立日本第二所帝国大学，以期在文化学术方面能够与东京相抗衡，挽回他们固有的优越性，也是京都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能够因一所大学的建立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因此，京都帝国大学在京都地区建立时得到了京都地区各界的鼎力相助，这也为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与东京大学的文科相抗衡，赢得了宽松的学术空间和民意基础。

从1868年在东京成立帝国大学开始，此后的30年里，在日本被称为“大学”的学校只有一所，即东京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是由幕末时期为传播西洋学问由政府建立的“藩书调所”发展起来的，后来机构自身进行了整备扩充，改名东京大学。1886年根据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东京大学成为日本帝国大学，因当时帝国大学只此一所，所以没有冠以“东京帝国大学”之名的必要。

1895年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国力大增，对一些实用学科方面人才需求也开始增长，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的呼声日益高涨。东京大学在日本关东地区，为求得地域上的平衡，第二所帝国大学理所

当然应该建立在关西地区，关西地区的中心是日本有名的商业都市大阪，在一个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建立一所想要纯粹做学问的大学，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最后决定选择京都。虽然彼时日本国内体制激变，都城已由京都迁往东京，但是京都地区悠久的汉学传统和崇尚学问的民风为日本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与东京大学相同的情况是，京都大学也是以原来就存在的机构为发展的基础。1869年大阪建立舍密局，1889年舍密局由大阪搬到京都，改名第三高等中学校，后又倾注精力和财力，利用市外吉田的广大土地，1894年扩建为第三高等学校，直到1897年，在第三高等学校的校址上，日本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之初，规模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三分之二，最初设立的是理工科大学，接着是法科大学、医科大学。这样，为适应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社会发展的需求，日本所建立的第二所帝国大学所应具备的条件就基本齐备了。

但是京都大学成立之初，要不要建立文科大学的争议正处于喧嚣阶段，是文科大学建立之前最大的困难时期，当时即使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文科招生也不能满员，再加上当时日本和俄国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在京都大学设立文科的事情就一直被搁置起来，没有立即实现。但是上至文部省大臣西园寺公望，下至总长木下广次和之前计划以文科大学教授身份进入京大的学者们，都对文科大学的成立翘首以盼，并不断争取致力于它的成立。当时还是大阪朝日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针对这一争议，也在1901年8月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以支持文科大学的成立并与东京大学形成对峙之势，这三篇评论分别是《京都大学的文科》、《关西的文化和京都大学》、《京都大学和樸学士》，他呼吁要在关西建立文科大学，打破东京帝国大学一家垄断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直到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后，以这次胜利为契机，国内很多矛盾暴露出来亟待解决，日本当时也正值文运兴隆之际，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断向文部当局施压，在1905年提交了创设预算，1906年议会法案通过，至此，文科大学宣告正式成立。

1.1.2 京都学派文化地理空间的“外层空间”——京都学派对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回应和反拨

这里将要讨论的是京都学派文化地理空间中社会的思想的因素。从19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社会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冲击开始发生转型，促进了日本近代文化的生成，中国学研究也从对各国文化的研究中独立出来。19世纪80年代东京帝国大学率先成立教育研究日本和中国传统学术和历史的学科，即和、汉文学科。这里的文学包括日本、中国古典在内的经学、诸子、史学、诗文等传统学术在内的内容。然而为适应社会人才的需要，即使是在和、汉学科学学习的学生，也必须要在学习欧美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和保持本邦旧有的文化和固有的学术传统，致力于发掘新的民族主义。可见，东京大学中国学研究的方向和内涵，要受到在东京帝国大学占据主流地位的、受过欧洲近代思想的熏陶、骨子里又都是拥护天皇和国家体制的官方学者们所控制。为了打破这种学术态势和西学近代思想指导下的为天皇服务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专制，20世纪初，在京都大学的文科大学聚集了一批以考据学为中心、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营造一种不受官方思想专制的、自由灵活、多样化的学风。

古今中外很多学派是以扭转或者推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传统为契机成立的。17世纪初期，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为了自身统治，大力支持宋明理学，目的是从中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于是支持儒学大师林罗山在江户（东京）地区建立了“官学朱子学”，之后日本汉学便一直以“朱子学”为主流，朱子学在汉学研究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为扭转这种非自由的官学学术垄断，17世纪后期，伊藤仁斋等在京都创立“古学派”，高扬“古典回归”，阐明“经典本意”，以抗击“官学朱子学”。20世纪初京都大学研究中国

学的学者们又一次将这种学术上的对立与逆转上演。反对东京帝国大学为政府服务的学术专制，致力于创造一种纯学术的、自由的学风。京都大学成立之初就抱有区别于东京帝大形成自己独特学风理想，文科大学成立以后，这种独特的学风逐渐显露、形成，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形成气候，在世界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西化之风盛行，学问体系、理念渐趋于欧化的时期，京都大学大放异彩的中国学研究成为日本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甲午中日海战之后日本明治政府逐渐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恐怕也是京都大学中国学能够蓬勃发展、不受限制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开展中国学研究是受到政府鼓励的，这也使得京都大学文科坚持纯学术立场的多数学者能够借此机会，使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

1.1.3 京都学派文化地理空间的“内层空间”——京大文科大学的学科和学风

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建立为京都学派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物理空间，也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以中国学研究为鲜明特色的学术空间，把这一学术空间看作一个整体，有着共同观点和学术追求的学者就在这一空间内，作为学术的载体互相碰撞、影响，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中国学研究学风。

京都大学的文科设置情况与东京大学的全面欧化不同，从教员到学科分类到课程内容都显示了它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学问体系。

东京大学初设之时，文学部分为第一科和第二科。第一科包括史学、哲学、政治学，该科完全按照西方理论和方法建置，内容也只限于西方的学问体系，例如史学，当时的史学科只是讲授西方的历史进程，采用欧美人编写的教科书，完全遵循欧美特别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理论。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科1906年成立当年只有哲学科，第二年成立史学科、再下一年成立文学科。与东京大学把中国研究统归于和、汉学科不同的是，当时京都大学文科把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分成三个独立的学科，这奠定了京都大学文科中国学研究繁盛发展的重要基础。当时主要的教员有中国哲学的狩野直喜、小岛佑马、武内义雄；中国史学的内藤湖南、桑原鹭藏、羽田亨；中国文学的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除此之外，哲学方面还有著名学者西田几多郎、日本史方面的内田银藏、人文地理学的小川琢治、考古学的滨田耕作等等，与东京大学大量聘请欧洲学者做教授，追求完全的西洋学风不同，京大文科大学的外国教员极少，甚至西洋文学科教员都是由日本人担任。

京都大学设立之初，第一任总长木下广次就在开学誓词中宣布：京都大学不能成为东京大学的附庸，而是要成为具备固有发展理念、独特学风的完全独立的大学。持有同样理念并将自己的主张发表出来的还有不少人，包括当时政府的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和大阪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内藤湖南。这一宣言极大地影响了京都大学独特学风的形成及其以后的发展趋势。面对理工科课程设置的固定化和科学性，要打破东京帝国大学在学界的垄断地位，从文科入手是最好的办法。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必须要挣脱束缚、实现自由开阔的思考研究，言论集中、一家之言对学问的开阔性发展都无益，因此实现日本文科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新的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肩上。

这种所要建立的开放、自由的学风从文科大学成立之初，对教师的选用问题上就可见一斑。与东京大学死板的遵循聘用留洋博士或者外国学者不同，京都大学对教师的选用不拘泥于学历的高低和出身学校的好坏，而是注重真才实学。灵活务实地选用了一些当时很有影响但不具备高学历的社会人士，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聘用，这样的决断为京都大学注入了新鲜的、多样化的言论和学术，在当时的社会和学校内部引起很多争议。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发掘这些人才的第

一任文科大学校长狩野亨吉所具有的不凡慧眼和坚定信念。

正是在这种不受压制，没有言论导向的自由学风中，作为京都学派文化地理空间中最为核心的内层空间在京大文科大学渐渐形成，在这个自由开放的空间内，学者们互相影响、启发、交流、碰撞，最后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

1.1.4 京都学派文化地理空间的“内层空间”——京大文科大学的师承因素

在京都大学文科大学这个内层空间，除了自由开放的学风以外，最为重要的还在于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为中心的热衷中国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的存在，由于特殊的师承关系，他们形成了一个内层空间的网络要素。这些学者除了相关学科的教授之外，大多是狩野或者内藤的学生，受到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具备相同的师承关系，受到老师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当时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主要的代表学者有作为创始者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青木正儿、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等。他们在中国学的各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例如与狩野直喜同时开设中国文学的铃木虎雄在诗词戏曲方面都有建树；青木正儿更是为中国戏曲研究填补了空白，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创作了《明清戏曲史》，至今仍是戏曲研究界重要的著作；神田喜一郎作为内藤湖南的学生在敦煌学、金石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

而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作为后来京都学派的领袖，是京都学派得以形成最关键的中心人物，可以将他们视为内层空间网络的重要节点，或者称他们是支撑内层空间的两大支柱。如果没有他们对中国哲学、文学、史学等学术问题的出色研究，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不会呈现出那般鲜明的特色，这是在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共同努力下实现的。虽然两人的学术观点中所具有的相同属性是主要方面，但是由于两人受教育的经历、生活空间、工作经历的不同，形成学术上的统一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碰撞、磨合。

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与当时全面接受西方教育的留洋学者不同，两人都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与中国和中国学问的长时间近距离接触，促使他们的学术向着中国学方面发展。狩野从中学时期接受的便是传统的古典教育，进入大学之后师从著名中国学家岛田篁村。岛田篁村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崇尚西学的潮流中，为数稀少的以清朝考据学治学的学者，狩野直喜完全继承了老师的治学方法，后来狩野又曾去处于清朝的中国留学，长期浸染于中国古代典籍和清代学术氛围之中，使他形成了一种“以中国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态度。吉川幸次郎曾在其著述《我的留学记》中这样总结：“京都的中国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这种治学原则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位先生。”⁵⁾当然，吉川幸次郎这里所说的“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因为客观事实的约束，只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但却显示出一种尽量摆脱主观意识来解读中国学问的态度。狩野曾经说：“研究中国学问当务之急首先是从日本式的兴趣——如语言表现上要从俳句式的兴趣中脱离出来，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只是粗略地阅读日本人写的汉文汉诗，而应该用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式去攻读中国原典。”⁶⁾吉川幸次郎把这种治学态度称为“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⁷⁾

5) 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第3、4页，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6) 吉川幸次郎《桑原博士与我》，《桑原鹭藏全集》第三卷，“月报3”，岩波书店1968年。转引自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第43页，中华书局2007年3月第1版。

7) 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第3、4页，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狩野对清代学术有深厚的兴趣和修养，长期在文学部开设“清代经学”、“清代学术沿革史”等课程，狩野一生始终坚持对中国学的研究，他能够形成这种治学方法、态度的原因大部分来源于直接的师承。

相对狩野直喜，内藤湖南走向中国学研究的经历是极其复杂的，主要是通过一种没有直接传授、文字性、间接性的师承渠道来实现的。内藤湖南出身于具有汉学传统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从汉学典籍开始的，但是之后兴趣转向日本古代史。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记者的工作原因，他接触到了现实的中国，出于实用的目的开始研究中国，但一般把眼光放在时事、政治方面。出于各种原因他先后十次到过中国考察，与中国文人接触频繁，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评论。后来，因其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学术著作的发表，得以在京都大学任教。在与清朝文人的接触和在京都大学与狩野等人的接触中，内藤由原来复杂多样的兴趣领域逐渐转向单纯的中国学研究。从他的学术著作来看，晚年已经完全转入到对中国古代史，金石学、甲骨文等的研究上来，也许那种强烈的坚持学问要实用的态度，在他京都大学长期的执教中也渐渐削弱了。

另外，狩野和内藤在研究中国学的方法上都重视实地考察，在他们的影响下，京都大学文科很多学者都曾前往中国留学或进行过考察活动，与中国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流。除了上述狩野直喜曾留学清朝、内藤湖南曾多次对中国进行考察以外，小川环树、吉川幸次郎、小岛佑马、仓石武四郎等很多学者都曾留学中国，后来成为京都学派的第二、三代中坚力量。京都大学文科学者还与当时中国的学者之间往来不断，例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与王国维、罗振玉的密切交往；内藤湖南与沈曾植、文廷式、刘鹗等人的交往；青木正儿与胡适之间有关小说考证和戏曲研究方面的交往等等。

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位对京都学派的完善与成熟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王国维。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的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在学术上往来甚频，他的“二重证据法”深深影响了京都学派的学者，京都学派在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接受了“二重证据法”，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实证研究学风，成功转向以全新的眼光、态度以及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有关中国的学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所具有的共同点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热爱、实地考察、以中国视角看待中国、乾嘉考据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不同点是走向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然而殊途同归，在两人的引领下，京都学派的中国学研究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中国学的辉煌。

1.1.5 京都学派的内外层空间

总之，京都学派得以形成的文化地理空间是一个双层空间形态：外层是京都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它的构成要素纷繁多样、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千年古都的历史积淀、近代发展的地域需求、对时代学术风气和思想状况的回应和反拨，使京都大学落户在此，京都包容并孕育了京都大学，为它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养料，创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条件。内层空间是京都大学文科大学，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让因志趣相投而汇聚起来的一批有志于改变中国学研究面貌，乃至改变近代日本学术风气的学术精英走在一起，他们开创了新的学风，开创了从明治中期经大正到昭和的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使得传统的盲目趋同的汉学研究转向了全新的把“学问”看做客体并尽量消除偏见的近代中国学。在日本经受西方文化狂风暴雨式的洗礼时期，以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为中心的京都学派学者们，以对中国现状、中国学术的关注并持续研究的态度，批判继承了日本汉学的衣钵，使日本汉学传统不致被淹没在西学汹涌的潮流之中，得以延续下来，并逐步引领其发展到现代的中国学研究轨道上。在明治以来整个日本社会崇尚西

方、蔑视中国的社会潮流下与中国学术界紧密交流和联系，京都大学文科在当时整体西化的日本学术界可谓独树一帜。

由此看来，具备了双层的发展空间的京都学派”，能够在上述地域、人物、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日本乃至世界的中国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辉煌的成就和贡献，也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虽然京都学派形成的文化地理空间以京都地区为基本区域，但是，这一空间又不是凝滞不变的，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它又是动态的，呈现出部分空间的转移。带来这种变动的是人物。人物在学术空间内交流、影响、互动的同时，也能使文化地理空间发生一定的变动。如内藤湖南的中国游历和访学、狩野直喜赴欧洲的学术考察、王国维、罗振玉迁至日本京都等等，或使得原本的文化地理空间呈现部分外移，或者为原本的空间携入一片新天地。以下部分将重点探讨京都学派学术交流空间形成过程中，主要代表性人物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实际状态，考察他们是如何营造出学派特有的学术空间环境、如何启发和刺激各自的学术变化和转型、如何相互协作推出整个学派的丰硕成果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人物的移动对文化地理空间产生怎样的作用。

2 京都学派得以形成的学术交流空间

相对于文化地理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多彩的要素，支撑学术交流空间的主体是人物，所流动着的是学术、信息和精神。这里主要以京都学派两大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对京都学派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京都时代的王国维甚至可以视为学派的一员）为例通过重点考察和考证他们三人之间，特别是王国维与前两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和互动，来认识这一学术交流空间的内涵，感受这种交往的现场氛围和学术魅力。

2.1 王国维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学术交流

如果说，京都学派的文化地理空间更多的具有客观、被动、外在、环境等特征的话，那么在京都学派的学术交流空间，更多地呈现出主观、能动、内在、主体的特征。学术交流的载体是人物，流动着的是信息，从具体的交流方式来看，往往体现着文化交流的一般方式。文化交流史的学习告诉我们，两个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形式上有单向、双向，有辐射式、网络式、回流式、点线面的对应等等，如果小到某一个学术圈与另一学术圈或者个别的学术载体之间的学术交流范围，这些空间上文化交流的表现形式依然存在。

京都学派的学者因中国学的研究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事哲学、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各大门类的研究，具体的研究方向更是多种多样。他们大都是日本中国学研究某一领域的领军学者，同时，他们当中也有不少学贯中西的通才巨匠、引领潮流的先驱大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王国维。王国维同他们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京都学派学术交流空间的内涵，突出地彰显了京都学派的学术风格，是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的典型而成功的范例。

2.1.1 王国维与狩野直喜的学术交流

在京都学派的学者当中，狩野直喜是与王国维关系最为密切、学术交往最多的学者之一。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对狩野直喜影响颇大，而狩野直喜游历欧洲期间所收集的敦煌文献资料及其基于敦煌文献对中

国俗文学进行的研究也为王国维的学术变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契机。

早在1900年，狩野直喜来中国留学时，便从当时任上海东文学社教习的藤田丰八那里听说过王国维，狩野直喜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初闻王君之名，时间甚早，大概是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在中国上海留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友人之一藤田丰八博士，正在罗叔言君所主办的东文学社担任教习，博士告诉我，他所教的学生某君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当时中国青年有志于新学的，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感兴趣，现在情况也差不多，而想尝试研究西洋哲学者却罕见。藤田博士⁸⁾极赏识该生，说了许多夸奖他的话，但是我始终没有与之见面，此某君即后来鼎鼎大名的王静安先生。”⁹⁾

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以及其它京都学派中国学家交往的契机是敦煌文献。1910年8月，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闻听被斯坦因、伯希和劫后残余的部分敦煌遗书已运至北京，存于学部，特偕同京都诸教授来中国调查。狩野直喜曾回忆：“明治四十三年左右，据闻敦煌发现的遗书运到前清新设的学部保管，我国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浜田耕作、富冈谦藏诸君，奉命共赴北京调查。那时罗叔言君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藤田丰八博士亦在其下任教职，为我们的遗书调查工作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当时王静安君也在农科大学做职员，为我们一行照顾不少。”¹⁰⁾此次在中国，狩野直喜一行逗留50多天，为王国维与京都大学教授之间建立长久的学术友谊提供了机会，也为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学术深交创造了条件。

1911年12月，王国维移居京都以后，狩野常去拜访王国维，两人继续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彼此受益颇多。王国维在送狩野直喜1912年去欧洲游学之时写的《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中回忆到：“四方蹙蹙终安骋？幡然鼓棹来扶桑。扶桑风物由来美，旧雨相逢各欢喜。卜居爱住春明坊，择临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刷可哀。”¹¹⁾狩野直喜于经学造诣颇深，王国维与之谈论“旧学”、“新知”的愉悦在诗句中表露无遗。

1916年2月4日，王国维离开日本，狩野直喜专程往车站送行，之后他和狩野直喜一直保持书信联系。现在能够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有六封，即1920年王国维写给狩野的一封信，狩野写给王国维无确切日期的五封。在这些信中，狩野直喜与王国维大多是互通学术信息，互赠学术著作，但也不乏对人生、文化和时局问题的感慨和讨论，于其中的言语能看出两人之间深厚的知己之情。例如王国维在给狩野的信中曾有感叹：“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¹²⁾又提到：“世界新潮湏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近者道也。”¹³⁾这种对人生死生聚散的慨叹、东方文化道德将在世界范围内盛行问题的讨论，在王国

8) 藤田博士（1925-28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藤田丰八）

9) 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原题《王静安君を憶う》，原载《芸文》第十八号八号。转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 同上。

11) 姚金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观堂集林·缀林·诗》之《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12) 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 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1页。

13) 同上。

维给其它日本学者的信件中从未出现过，独在给狩野的信件中提到，追其原因除在学术上有共同追求之外，两人在人生态度和政治观点上共同的价值取向可能也是一方面。作为清朝遗老和传统文人的王国维拥护帝制反对革命的立场自不必言，狩野亦自称为“儒臣”，崇尚儒家观念，拥护天皇，曾多次为天皇进学，对中国的溥仪皇帝他也极其尊敬，1924年11月，溥仪被逼出宫，狩野得知消息后写信给王国维对溥仪和清政府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称举事逼宫者为“大逆之徒”，言辞非常愤慨。学问方面的共同爱好、对人生的共同感悟、以及政治方面的相同取向，使王国维和狩野直喜的友情存在共同的基础，因此弥加深厚。

王国维与狩野直喜的密切往来，带来他们之间学术上的互动和互助，特别是在戏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对狩野直喜影响颇大，而狩野直喜游历欧洲期间所收集的敦煌文献资料及其基于敦煌文献对中国俗文学进行的研究也为王国维的学术变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契机。

如前所述，在1910年京都大学诸教授去北京查访敦煌古书时，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就开始了在戏曲方面的探讨，对那一时期的情况狩野直喜曾经回忆到：“适其时我也想研究元代戏曲，已在京都大学讲授元的杂剧，恰好王静安君也和我的研究相同，他已著有《曲录》及《戏曲考原》等书，因此我利用旅居北京之便，与王君见面，听取他对元代杂剧研究的心得，感到很受启发。那时《大阪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引起世人注意，小川博士见了中国好友完全在议论南极北极的问题，我则与王君讨论中国戏曲中的南曲北曲。在旅居北京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周围的中国人，将南极北极与南曲北曲对比，成为一则笑话。”¹⁴⁾

这段时间王国维和狩野直喜的友谊在讨论南曲北曲中得到了深入发展。此日之前狩野直喜已经在日本京都大学和铃木虎雄共同主持文学讲座，讲解元曲，关于元曲的研究成果有论文《水浒传与中国的戏剧》发表在《芸文》杂志上，¹⁵⁾在这篇论文中狩野直喜提出并论证了水浒戏剧的出现早于水浒小说的观点。而此时王国维在戏曲方面已著有《曲录》和《戏曲考原》。相对狩野直喜单独研究某个戏曲，在细节中考证客观问题而言，王国维对戏曲的研究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两人的研究层面互有所长，在讨论中能够相互进益，更应强调的恐怕是王国维的研究心得对狩野直喜的启发和影响，这从狩野直喜此次回到日本后频繁发表关于元曲研究的论文可以看出。回国后狩野利用在京查找的元曲资料白仁甫《天籁集》进行研究，完成了论文《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の〈梧桐雨〉》。¹⁶⁾另外他还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了论文《论支那戏曲——以〈琵琶行〉为材料》。¹⁷⁾之后都被收录于《支那学文藪》。这些论文都是在与王国维进行讨论之后的1911年底发表的。

王国维寓居京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对宋元戏曲进行研究，1912年9月撰成《古剧脚色考》一书，对戏剧中出现的各类脚色做了详细缜密的论考，在前言中王国维说此书“就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考其渊源变化，并附以私见。”翌年1月即撰成其戏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宋元戏曲史》（亦称《宋元戏曲考》），而狩野直喜在1910年以后直至退休，每年都要在讲台上对元曲进行讲读，后来研究领域扩大到敦煌古书中的俗文学研究。

1912年10月，狩野直喜赴欧洲游学，除了调查欧洲东洋学研究状况之外，其主要目的是调查英国伦敦

14) 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原题《王静安君を憶う》，原载《芸文》第十八号八号。南极、北极在日语发音中与南曲、北曲相同。

15) 原题为《水浒传と支那戯曲》，载《芸文》第一年五号。

16) 原题为《元曲の由来と白仁甫の〈梧桐雨〉》，载《芸文》第二年二、三号。

17) 原题为《琵琶行を材料としたる支那戯曲に就いて》，自1910年1月8日始载。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斯坦因带回的敦煌古书，以及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古书¹⁸⁾。狩野直喜从欧洲回国后，于1916年发表了以《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¹⁹⁾为题的研究报告，这是狩野直喜追踪敦煌文献和西域文献，并进行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其间提到发现了“用雅俗折中体或曰口语体写成的散文或韵文小说”，²⁰⁾ 这些小说即现今称为“变文”的敦煌故事，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狩野直喜对其源流和影响进行了初步考证。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考证狩野直喜认为，“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则更获一大发展也。”²¹⁾ 在俄罗斯游历时，他在考察被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发掘我国西北张掖、黑水故城址时获得的文献中，发现了我国戏剧史上的珍宝《刘知远诸宫调》残本，狩野直喜把其称作“杂剧零本”。²²⁾ 狩野直喜的这两大发现为中国俗文学的发展理清了脉络，把小说和弹词的起源提早到了唐代，可谓功不可没。

对狩野直喜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最早作出呼应的是王国维。狩野归国后，王国维对狩野在欧洲所抄录的资料进行了笔录，后来根据这些笔录向学术界介绍的敦煌文献有：《唐写本残职官书》、《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唐写本灵棋经残卷》、《唐写本失名残卷》、《唐写本大云经疏》、《唐写本韦庄秦妇吟残诗》、《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唐写本残小说》、《唐写季布歌》、《唐写本敦煌县户籍》等等，王国维对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一一做了跋文，这是王国维依据狩野带回的敦煌文献资料作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部分跋文基本上都作于1919年，在对狩野带回的这些敦煌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后的1920年，王国维又参考狩野的《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在《东方杂志》17卷第9期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言及敦煌文献资料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后来，王国维又通过多方收集资料把狩野带回的《唐写本韦庄秦妇吟残诗》完备为一千六百六十字，《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也在后来学者的努力下成为王国维跋文中所说的完整的三十首。

当时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来源一是斯坦因、伯希和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二是伯希和运送文献归国途中中国学者抄录的一部分，在数量和价值上都有限。研究中国古代学问的人难以去国外查阅、抄

18) 关于在欧洲考察的成果，狩野在1913年1月22日从欧洲给内藤湖南和桑原鹭藏的信中做了详细的描述：“我最初访问伯希和先生时，他给我看了他曾寄给罗君的一些照片，料想这些资料可能已经邮送到罗君手中，老兄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其中包括论语郑注，确实是珍品中的珍品，尤其从经学角度上来看，更觉是稀世之物。……今天阅览敦煌遗书过程中，看到与西本愿寺西晋写经字体相同的资料。在写经之外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我毕竟没有时间查阅写经以外的东西，于是不免感到很遗憾。陆德明释文尚书也很有意思，我抄写了一部分，还有很多演义类的断片和估计是宋杂剧起源方面的断片（时代是五代或宋初），每天便如行走在山阴路上一样应接不暇。”此信后来发表在《芸文》第四年第四号《海外通信》栏，关西大学图书馆藏。

19) 原题为《支那俗文学史研究の材料》，分上、下分别载于《芸文》七年一号、三号。

20) 文中说，“我在英法二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从事敦煌遗书研究之际，偶然发现之喜出望外，乃抄写其中一部分带回，……我对此抄本犹感兴趣之原因在于它们写成于唐末或五代，换言之，从中可知元朝以后俗文学的萌芽在唐末或五代就已经出现。”原载《芸文》七年一号、三号（1916年）

21) 黄仕忠《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 狩野在旁加了注文：“只是略加观摩不敢断言，但总觉得像是宋槧刻本，比普通的古今杂剧版式要旧。如果真的是宋槧，那就是海内孤本，在元曲源流中将大放光彩，只可惜纸张破损太多。”这是狩野直喜从俄国寄给京都大学同僚的信，刊登在《芸文》四年一号《海外通信》栏。

写敦煌文献。王国维却得到狩野直喜无私提供的的大量文献。后来王国维在敦煌学上做出的成果大都与狩野直喜提供的资料有关，他也曾多次引用狩野直喜的观点。由此可见，狩野直喜在敦煌文献和俗文学研究方面的开创之功以及对王国维敦煌学研究影响之大。

从上面对王国维与狩野直喜学术交往的分析可以得知他们个人的学术空间的重叠部分是敦煌学和戏曲，这些重叠部分正是京都学派学术交流空间得以生长扩大的区域。在频繁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两人各自找到了对方学术空间里与自己研究的结点，于是围绕这些点展开讨论和交流，从而得到新的启发，做出新的成绩。

2.1.2 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的学术交流

从研究的内容方面看，内藤湖南和王国维之间的学术上的交流互动深入到利用甲骨文研究古史的领域。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内藤湖南曾力劝王国维和罗振玉东渡日本。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的交往和与狩野直喜交往时经常促膝长谈的方式不同，大概与内藤善交游而王国维却比较内向的性格有关，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成为学术上的伙伴。

早在1902年10月，内藤湖南就作为《大阪朝日新闻》记者，访问过北京崇文门外的刘鹗私宅，亲眼目睹了中国出土的第一批甲骨文字片，并观看了刘鹗拓片的过程。内藤是世界上见到甲骨文字的第一位外国人²³⁾但是那时作为报社记者的内藤湖南对这些雕有文字的甲骨仅仅是觉得稀奇而已，并没有兴致研究这类问题，那时他的兴趣在于对中国时事问题的研究和对清朝历史尤其是清朝入关之前历史的研究，直到1911年，内藤湖南任京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开始主持东洋史讲座之后，他的研究方向才开始发生转折。内藤湖南的弟子神田喜一郎在《内藤湖南先生与支那古代史》²⁴⁾中对内藤湖南这一研究方向发生转折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一是因为内藤湖南由当代时事专题记者转而成为埋头于学问的大学教授，职业发生了变化；二是因为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内藤湖南的旧友罗振玉和王国维正好在这个时期逃亡到日本，内藤湖南与两人重温旧谊、交往甚频，因而受到影响。

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交往从1899年第一次中国游历时便开始了，当时罗振玉在上海主持东文学社，通过在东文学社担任教习的日本友人藤田丰八，内藤结识了罗振玉，两人很多方面兴趣相同，一见如故。罗将自己早年著作《面壁精舍杂文甲乙编》、《读碑小笺》等四册书赠送内藤，内藤回赠了他的《近世文学史论》。另外内藤把从日本带来的有延历（日本平安时代年号，782~806年）敕定印的“右军书草”、“法隆寺金堂释迦佛”等七种珍贵书画的拓本以及“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送于罗振玉，罗则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唐张希古墓志”等十余种拓本回赠之。那时罗振玉便与内藤湖南讨论过有关甲骨学的问题。到1902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中国，亲眼见到甲骨实物，并再次与罗振玉讨论金石、甲骨等学问，虽然他回国以后没有马上着手致力于对甲骨的研究，但是其心里肯定早就跃跃欲试。但是一方面研究甲骨学的资料难以搜求，另一方面当时的记者身份让他无暇专注于此学。直到1911年罗振

23) 另外接触甲骨文较早的还有日本汉学家林泰辅，他曾与日本主张“尧舜禹抹杀论”的学者展开激烈论争，失败后曾希望通过甲骨文研究重新确立中国古史。

24) 原题为《内藤湖南と支那古代史》。

玉和王国维避难京都，带来了大量珍贵的甲骨原片和拓片，为研究甲骨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加上内藤此时大学教授的身份，于是长期以来的搁置的研究具备了实现的基础，逐渐开始了对甲骨学的研究。应该说罗振玉和王国维带去的珍贵甲骨、金石拓片等珍贵文物资料以及他们关于甲骨文研究的频频著作，不但影响了内藤湖南，而且影响了整个日本对甲骨文研究的关注并扭转了当时日本对甲骨文存在的真实性有所怀疑的局面。

王国维初到日本之时也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古史研究上，直到1912年完成《宋元戏曲史》才开始着手研究经史、文字学、并利用甲骨、金文、古器物等实物来考订纸上之学问，尤其在利用甲骨文考定中国古史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自从1912年罗振玉的大部分藏书运到日本之后，王国维利用大云书库的藏书和甲骨、古器物、封泥等珍贵收藏品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1914年年末，与罗振玉合作完成《殷墟书契考释》，此书的出版对内藤湖南的触动很大，神田喜一郎认为，内藤湖南就是从这时起，开始真正关注甲骨文，并把其作为中国古史资料进行研究的。1914、1915年前后，内藤湖南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1915年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东洋史概要》课程中主动开设了“中国上古史”讲座，他根据王国维“王亥为殷之先公”的考定，运用考释甲骨文实物，然后与纸上相关的古史资料相互参证来研究殷朝帝王的方法，发表《王亥》一文。²⁵⁾ 王国维又受到内藤湖南的启发，写出那篇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此文的序言中王国维写道：“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²⁶⁾ 1922年内藤湖南又发表《续王亥》，影响不如《王亥》。后来内藤湖南在中国古史方面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提出了著名的针对古代传说的“加上说”，晚年还收集了大量的金石拓本，打算利用金文、甲骨文等确凿的史料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中进一步探索，以揭示历史的真相。

内藤湖南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契机到利用甲骨文、金文等实物史料的治学方法，可以说都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王国维也在与内藤湖南的学术交往中更加巩固和拓展了自己在甲骨文字和古史考订方面的研究，他在《国学丛刊》上发表的《洛诰解》一篇，还引起了与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争，在中日学术交流史上亦传为佳话。

王国维归国后与内藤湖南依然保持往来。内藤与富冈谦藏曾一同到中国河南参观甲骨文出土地，途经上海看望王国维，在上海期间王国维曾为他引荐沈曾植等人。在等待内藤湖南来上海期间，王国维曾给罗振玉连续三封信询问内藤湖南行程，可见王国维对其殷切期盼之情，内藤湖南继续西行时王国维还曾赋诗《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以送别。

由于内藤湖南忙于学术，平时写信不多。王国维称他：“性疏懒甚，永不肯作书。”所以现在见到的只有《王国维全集·书信》中收入的王国维在1924年1月30日写给内藤湖南寄去《观堂集林》一书的附信；葛兆光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收录的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王国维写给内藤湖南的三封信；²⁷⁾ 还有内藤湖南在1924年7月去欧洲游历之前，给王国维寄去日本友人铃木

25) 载《艺文》七年七号（1916年）。

26)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王国维文集》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7) 一封是关于罗振玉收藏顺利入沪之事，一封是关于王离开京都三年后赠送唐本陆法言《切韵》给内藤、狩野等人之事，一封是关于王国维赠送初回上海时所办杂志给内藤之事。关西大学藤田高夫教授带领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对内藤文库中的信件进行整理，以期实现电子化。我们也期待通过对上万件往来信函的整理能够发现内藤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交往

虎雄等送他西游之诗，并希望得到王国维和诗的信件。²⁸⁾

虽然往来书信的数量不多，但是通过王国维给内藤湖南的信中内容可知，王国维与内藤之间的学术联系从未中断过，互赠学术著作和诗歌互答的情况一直存在着。²⁹⁾ 内藤湖南的学生神田喜一郎与王国维往来信件非常频繁，是迄今有所保留的信件中数量最多的。其间神田除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也经常报告老师内藤湖南的情况，在王国维和内藤湖南的学术著作互赠中常常起中介作用。内藤还曾经有过延揽王国维到京都大学任教之意。³⁰⁾

1925年，内藤虎次郎花甲之寿，应神田喜一郎来信邀请，王国维于9月寄历史地理论文《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篇，加入祝寿论集。另外，王国维还曾在1917年根据内藤湖南所赠残卷写成《跋魏毋邱俭丸都山纪功刻石残卷》，后来此跋被略加修改，题为《魏毋邱俭丸都山纪功刻石跋》，收入《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下卷，又编入《观堂集林》卷十六。

王国维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与之相熟的京都学派学者皆悲痛不已，内藤湖南更是担起了组织日本学者悼念王国维的责任，以其与王国维的相知，亦该担当此事。另外，日本大谷大学藏有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这原为王国维旧藏，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丁卯六月，王忠愍公自沉殉节，沪上蟬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获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³¹⁾ 1913年前后王国维转向史学研究，其戏曲旧藏多交罗振常。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罗振常将王之旧藏公示出售，以恤其孤。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未有中国学者有将王氏旧藏收购的动议，而日本学者多因敬重王氏之学，越洋认购。其中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³²⁾

上个世纪初中外学者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新领域，也是一场学术革命，王国维、罗振玉等人无疑是这场革命的领路人，他们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影响到中国学者，对诸如内藤湖南等日本中国学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殷墟甲骨刚刚面世时，很多日本汉学家不承认它的价值，甚至否认它的真实性，但是王国维和罗振玉凭借自己对殷墟甲骨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通过它对关于中国古史的一些记载进行了详实的考证，使得它的价值快速彰显出来，引起了内藤湖南等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跃跃欲试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后来在甲骨学和中国古史研究上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内藤湖南在甲骨文方面的具体研究和方法也影响到王国维，例如两人通过甲骨对殷商古帝王的轮番交互式的攀援考释就是很好的证明。

的新线索。

28) 见马奔腾，《文学遗产》，2007年第一期。内藤湖南在信中写到：“大雅不相闻久矣。春间所赐大作一再捧读，多闻所未闻，获益实大。弟游欧之役，顷方成装，以七月六日上舟矣。临发豹轩博士有见送七律二首，君山、雨山诸友皆有和章。弟亦漫成二律，今谨呈览。不知吾兄亦可赐和否？但弟不愿吾兄拘于豹公原韵，只能为弟作五七言长古一篇，以壮行色，至禱至禱。”信中还附有内藤所作相合之诗三首。可见，在诗文唱和方面，内藤与王国维也有交流。

29) 如“春间闻贵体违和，极深驰系，后闻快愈，又极欣慰。历次惠赠书籍，顷又蒙赐大著《宝左盒文》及十二长物影片，伏读一过，如亲晤对。”见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8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

30) 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曾经提道“内藤博士有欲延维至大学之意，盖出于相慕之真意。”

31) “沪上蟬隐主人”即罗振玉之弟罗振常。

32) 黄仕忠《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 王国维与京都学派整体的相互影响

王国维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从开始的西方哲学到后来的古典文学，再到经史、小学、金石、考古、历史地理等等，而且每一领域的成就都堪称卓越，令常人无法望其项背。而京都学派学者们大都术业有专攻，因此在考察王国维与京都学派诸学者的交流过程中可以发现，王国维常常像是一个放射学术光芒和灵感的据点，沿着这个点出发，又能找到其他学者研究领域中之与之呼应的另外一个结点，连成一条单独的线。然而这条线又不是单向的，两者的认识、心得、成就等等就通过这条线上来回交流、互换、充实，逐渐形成各自新的认识和成就，然后在原来的结点上，使这条线继续延伸，然后再次以这个延伸点为起点，交流、充实、延伸……从而在学术上呈现出一种交互攀援上升式的情景。王国维通过不同学术领域的直线传递，给予京都学派的学者以影响，而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也通过这条线传递给王国维新的信息，实现了京都学派学者在各自领域前进，而王国维在多个领域同时得到回馈，再把这些回馈的信息杂糅、整合，在多个领域得到启发和进步。

2.2.1 作为个人的王国维与作为群体的京都学派

初到日本的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的重点还是继续在国内未完成的戏曲研究，直到完成《宋元戏曲史》为终结。虽然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面对比邻而居、周围往来频繁的京大诸教授，每日都在谈论中国的传统学问，即王国维诗中所说“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³³⁾的情况，王国维自然而然受到熏陶和影响。这一时期，王国维周围的小环境是单纯的，他的世界只有学术，因此京都大学诸教授研究中国学的成果必然引起他的关注，恰巧此时的王国维认为自己的词曲研究已经达到目的，可以在文学研究方面暂告一段落。面对异邦蓬勃兴起的上述对中国历史、经学、文学、甲骨、敦煌等的研究热潮，再受到平时与罗振玉相互切磋的影响，王国维在学术兴趣上也开始发生转移。日本学者致力于中国传统学问之研究精神，也进一步激起王国维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再者，外国人无论对中国文化造诣有多深，也会受到本邦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往往难以从传统的中国文人角度去理解，而王国维却能够发挥他的优势，逐渐把经史、甲骨、敦煌文献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曾在1912年4月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请其代抄国内学者李振刚抄写的《敦煌逸经》送给京都大学诸教授，以印入《续藏经》中；在1913年3月份给缪荃孙的信中，谈到他半月后移居神乐冈八番地和移居之后的读书打算：“日读注疏一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期以不间断，不知能持久否。”³⁴⁾1913年11月的信中他又说道：“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³⁵⁾可以看出，王国维这时已经开始研究经史。

狩野直喜也在对那一时期的回忆中谈到了王国维学问变化：“不久清朝爆发大革命，王静安君携家与罗叔言君同来我京都，居住了五六年，在这期间，他与我始终往来不断。我观察到，王君从来京都开始学问倾向有所变化。这是说，王君似乎更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回避说自己不懂西洋哲学。其后从元代杂剧的研究扩大，写成《宋元戏曲史》，

33) 姚金铭 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观堂集林·缀林·诗》之《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34) 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 书信》，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35) 同上，第37页。

此书对王君可说是业余的著述。正如其常谓，杂剧的研究以《宋元戏曲史》为终结，以后不再研究了。若问当时王君学问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何处的话，实际上王君当时似在精读和重解《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也在精读，至少已经完成《前后汉书》《三国志》等的重新解读。寓居京都时闲暇日多，自然耽于精读，不为直接的目的而读书，真是件有意义的事。”³⁶⁾从狩野直喜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完成《宋元戏曲史》之后，王国维的学术兴趣已经开始转移到了经史。

京都学派在与王国维的互相影响、相互作用下逐渐成熟。王国维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等方面对整个京都学派的完善和成熟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京都学派的学术交流空间呈现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在治学方法上：王国维融合清朝考证学风和西方实证主义的做法影响了京都学派。狩野直喜曾经盛赞王国维的治学方法：“王静安先生的伟大，就在于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国故。”³⁷⁾当时中国接受西方思想的学者大都把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和宪政体制的具体内容上，很少有人关注西方学术的方法论，特别是用已经掌握的西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古物和文献，王国维却能创造性地把中西方二者兼而容之。转向经史研究后，他接受西方的治学方法但却拒绝接受西方伦理思想，他希望保存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但却不拘泥于传统的治学方法。他把西方实证主义的注重实物考察和乾嘉学派考据学融合在一起，即把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材料结合起来互相参证，开创了“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日本期间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大多使用“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强化了日本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学风，京都学派的治学既不像东京学派学者只推崇用西洋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又不同于清朝考据学派单纯的文本考据，而是既重视文本，又注重实地考察，这明显是受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影响。

在研究领域上：掀起了京都学派乃至日本学界戏曲学研究热潮、推动了甲骨文研究、敦煌学研究、汉诗词研究等向纵深的方向顺利发展，在其它诸如经史、甲骨、敦煌、金石、西北古地理的研究方面，王国维对京都学派中国学家的影响皆可谓深远，他与罗振玉给京都大学留下的学问印记至今还处处可见。

特别是在戏曲研究领域，虽然王国维于戏曲研究起步较日本学界晚，但却成就卓著，《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以上三种刊于1909年）、《古剧脚色考》（1911年）、《宋元戏曲考》（1912年）等著述为中国建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史学科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日本完成的《宋元戏曲史》，可以说是他此前若干年研究戏曲和杂剧的一个总结，也是他与狩野等人在学术上相互倾慕、相互扶助、相互促进的一个生动写照。他的戏曲研究对京都学派中国学戏曲领域后来一直领先于日本学界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而在当时即已把日本的戏曲研究推向了高潮。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上对狩野直喜的影响前已述及。此外，铃木虎雄早在1909年就开始关注王国维的戏曲研究，著文向日本学界介绍了王国维《曲录》和《戏曲考源》，后来又翻译了王国维的《古剧脚色考》。关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对铃木虎雄和西村天囚的影响，在铃木虎雄的《追忆王静庵君》（原题《王静安先生を追想す》）中可见一斑。根据铃木虎雄文中的回忆，王国维那时正在整理他的戏曲研究，由于经常与王接触并且翻译其作品的缘故，铃木虎雄也开始对戏曲研究感兴趣，为此屡屡拜访王国维，聆听教诲，并且为了练习曾经多次向王国维请教尝试圈点《琵琶记》。铃木虎雄还在文章中提到经常看到西村天囚博士拜访王国维，并在不久之后发表了关于南曲《琵琶记》的论文，王国维还为这

36) 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原题《王静安君を憶う》，原载《芸文》第十八号八号。

37) 袁英光 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个译本写了序。

狩野直喜的弟子青木正儿也在王国维的影响和启发下写出了《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之后，中国很多学者都想再进一步研究明清戏曲，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日本京都大学的青木正儿却在王国维的“明清戏曲都是死文学”的激发下完成了《中国近世戏曲史》，并在此书的序中对王国维把当时文人鄙为巷谈街说的戏曲作为专门学问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精神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还认为王国维的论著和他研究曲学的精神，不仅唤起了中国学者关注曲学，而且在日本也掀起研究中国戏曲的热潮。在王国维的一系列论著问世以后，日本学者的戏曲研究成果与之风云际会，蔚为大观，这股热潮不仅席卷了当时与王国维交往频繁的京都大学学者群，东京大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戏曲研究的又一个重镇。可以说，王国维以其对戏曲的开创性的研究影响了整个日本中国学界。同样在中国戏曲方面取得成就的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对这一时期的情况评价道：“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的研究发表新说，或竟先鞭于名曲底介绍与翻译，呈万马骄蹶，而驰骋盛况。”³⁸⁾

虽然王国维在京都学派学术交流空间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的一员，他是日本这个大的文化空间之外的文化载体，他终究属于中国这个更加庞大的文化空间。但是，学术无国界。一般而言，所谓“学派”，或多或少有一些自成一统、自我封闭的味道，但是京都学派的开放性特征接纳了王国维，也正是由于王国维的介入，京都学派的开放性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前京都学派虽然也致力于中国学的研究，坚持纯学术的立场，坚持不与政治沾边，但是毕竟其背景和空间的各个要素也存在局限。特别是它的研究对象中国对于日本学者来说终归是一个外部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京都学派的学术交流空间尤其需要导入中国的学术载体，嫁接中国的学术空间，实现“源头活水”的效果。占据中国近代学术高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到来，恰恰实现了京都学派的期待。而京都学派的文化地理空间和学术交流空间又让王国维如鱼得水。王国维的加入使京都学派在形成之后，实现了又一次飞跃性的大发展，走向了完善和成熟，成为日本乃至世界中国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鲜明、成就斐然的学术派别。

京都学派两个空间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治学环境也使王国维大受其益，对他的学术转型起到了刺激和推动作用。京都大学文科特别是中国学发展的定位和渐渐形成的京都学派的学风与王国维的学术志趣和治学倾向相吻合，作为京都学派重要支柱的东洋史研究（以中国传统史学、经学为中心）正方兴未艾，王国维在这里通过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一方面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投入到中国学的新领域当中，同时他的努力和成果也激发了日本中国学家研究新学问的兴趣；另一方面王国维又在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扩大了自己的研究。

交流和影响往往是相互的。京都学派学者与王国维的交流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可以说，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家对王国维的影响是“群体对个人”，即几个人或一个学派与一个人互相影响，而王国维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博学通儒、国学大家，对京都学派中国学家产生的影响却是“个人对群体”，即一个人影响几个人甚至影响整个学派。

虽然王国维性格内向，不善交游，但是仍凭借其学问上的深厚造诣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日本学者尤其是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中国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国维在日本期间取得如此大

38)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66页，大日本雄弁会版，1919年版。

的学术成就，与他同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家的接触、交流、互动密不可分，他与日本学者在学术上和人格上的互相影响成为学术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佳话。

3 结语

京都学派的学术交流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相比较，更多地呈现出主观、能动、内在、主体的特征。京都学派的学者因中国学的研究聚集在一起，他们兴致盎然地从事着几乎涵盖人文科学多有大门类的研究，具体的研究方向更是多种多样。鉴于学派人物众多，本文在论述学术交流空间载体时，只能在有限的篇幅内选取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中国的王国维。特别是王国维同他们两人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京都学派学术交流空间的内涵，突出地彰显了京都学派的学术风格，是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的典型而成功的范例。

王国维在京都学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的一员。然而学术无国界。正是因为京都学派的开放性特征邀请和接纳了王国维，京都学派的开放性才超越了一般的学术派别。也正因为京都学派对中国的学术载体的导入，使得京都学派的学术空间与和对王国维罗振玉的学术空间发生了奇妙的对接，进而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产生成功的嫁接，近代中日学术文化的最先端部分得以实现交汇。一方面，占据中国近代学术高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到来，实现了京都学派的期待。另一方面，京都学派的文化地理空间和学术交流空间又让王国维如鱼得水。王国维的加入使京都学派在形成之后，实现了一次飞跃性的大发展，走向了完善和成熟，成为日本乃至世界中国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鲜明、成就斐然的学术派别。

另外，在京都学派的两个空间——文化地理空间和学术交流空间之间，应该而且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于这种联系的细致分析将作为笔者今后的课题加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因素将是连接两个空间的纽带和中轴。这不仅是由于京都的文化地理空间中凝聚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和基因，而且更因为在学术交流空间中流淌着的是中国的文化信息、学术方法、人脉联系，因此能够使得两个空间相互融合、叠加、亦动亦静、浑然一体，承载和记录着京都学派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共同体的运行和发展。